

从《三宝垄华人编年史》看 伊斯兰教在印尼的早期传播

廖大珂

《三宝垄华人编年史》原稿出自印尼爪哇三宝垄（Semarang）、塔兰（Talang）、井里汶（Cheribon）三地华人庙宇所珍藏的档案，实际上就是记载 15—16 世纪当地华人社会的档案。本文根据《三宝垄华人编年史》有关华人穆斯林活动的记载，并结合中外史籍的相关资料，对早期华人穆斯林在印尼伊斯兰教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作一粗浅的探索，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考察印尼早期华侨华人的历史，论述华侨华人对印尼历史和文化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关键词：《三宝垄华人编年史》 伊斯兰教 印尼

作者廖大珂，1953 年生，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是东南亚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①关于东南亚伊斯兰教传自何处，历来言者纷歧，多数人认为是传自印度的古吉拉特邦。然而早在 19 世纪末，英国马礼逊著《外国史略》认为，郑和下西洋时到爪哇，“使弃偶像，而拜回回教主。^②”即伊斯兰教是由郑和传入的。近数十年来，东南亚伊斯兰教最早传自中国，是郑和传入的这一说法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如印尼学者巴林桐岸（Mangaradja Onggang Parlindungan）、斯拉默穆利亚纳（Slametmuljana）、新加坡学者李炯才等，他们的主要根据就是《三宝垄华人编年史》的记载。本文拟从《三宝垄华人编年史》的有关记载，对早期华人穆斯林在印尼伊斯兰教传播中的作用作一粗浅的探索，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关于《三宝垄华人编年史》

《三宝垄华人编年史》首见于印尼学者莽牙拉查·翁冈·巴林桐安于 1964 年在雅加达出版的《端古劳》（Tuanku Rao），该书是介绍印尼伊斯兰教历史的著作，《三宝垄华人编年史》是作为其附录。据巴林桐岸的《端古劳》，《三宝垄华人编年史》原稿出自印尼爪哇三宝垄（Semarang）、塔兰（Talang）、井里汶（Cheribon）三地华人庙宇所珍藏

^① 梅·加·李克莱弗斯著，周南京译：《印度尼西亚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年，第 5 页。

^② 马礼逊：《外国史略》，载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南清河王氏铸版，上海著易堂印行，再补编第十二帙，第 6 页。

的档案,这些档案实际上就是当地华人社会的档案。1925年,荷兰东印度殖民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波特曼(Poortmon)前往三宝垄等地的华人庙宇视察,他对研究历史很有兴趣,藉口将这些档案没收,占为己有。据说,仅从三宝垄的大觉寺,波特曼就掠走了三大袋的中文档案,然后对这些档案进行翻译研究。^①

另据已故的印尼斯拉默穆利亚纳教授的介绍,波特曼曾将华人庙宇的《三宝垄编年史》与《井里汶编年史》^②加上引言,然后进行刻印,但只印了5份。^③1940年,巴林桐岸在荷兰与波特曼相识,大约在1950年前后,在一次通信中,波特曼将自己的一批研究手稿寄给了在爪哇万隆(Bandung)定居的巴林桐岸,其中包括波特曼对《三宝垄编年史》和《井里汶编年史》加上注释的手稿。巴林桐岸对这些手稿进行研究,并根据印尼民间传说,对这二部手稿加以说明和注释,最后以《1411—1564年哈纳菲教派华人穆斯林在爪哇岛伊斯兰教传播中的作用》为名发表,并将《三宝垄编年史》和《井里汶编年史》合二为一,作为其附录。如今人们所能看到的就是这个经过巴林桐岸编辑的马来文本,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将这两部合编的《编年史》统称为《三宝垄华人编年史》,但该马来文本只是原稿的简缩本,原稿应是用中文写成。

二、旧港的华人穆斯林社区的形成

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可以追溯到7世纪。据14世纪埃及作家迪马斯基(Damashqi)的记载,在7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Uthman, 644-656年)执政时期,伊斯兰教就已经传入占婆^④。到11世纪,占婆的宾瞳龙地区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穆斯林聚居区^⑤。印尼的爪哇则在11世纪已出现穆斯林商人的社区,至14世纪发展到一定规模^⑥。在东爪哇泗水附近曾发现一个穆斯林妇女的陵墓,墓碑的年代为1082年,“表明已有相当人数的穆斯林居住于该地。”^⑦中国穆斯林移居东南亚可以追溯到宋代。1972年,在文莱发现了一座宋代古墓,其碑文为:“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应甲立。”^⑧文莱古名渤泥,景定甲子即1264年。据考证,“蒲公”即蒲宗闵,是一个中国穆斯林,他与其子蒲应、蒲甲于1247年出使渤泥,即侨居渤泥,

^① 钱江:《从马来文〈三宝垄纪年〉与〈井里汶纪年〉看郑和下西洋与印尼华人穆斯林社会》,未刊稿。本文的写作曾得到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钱江博士的大力帮助,特此致谢。

^② 《三宝垄编年史》主要记载1403年至1546年三宝垄华人社会的历史,《井里汶编年史》主要记载1415至1585年井里汶华人社会的历史。

^③ Slametmuljana, Islam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Islamic State of Demak, in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27, Parts 1 & 2, Singapore, December 1972, pp.41-83, p.81.

^④ C.R. Tibbetts, A Study of the Arabic Texts Containing Material on Southeast Asia, Leiden & London, 1979, p.63.

^⑤ S.Q. Fatimi, Islam Comes to Malaysia, Singapore, 1963, p.93.

^⑥ Taufik Abdulla, Islam and the Formation of Tradition in Indonesia, Itinerario, 1, 1989, Leiden, p.20.

^⑦ Fatima, op.cit, p.39.

^⑧ 庄为玘:《文莱国泉州宋墓考释》,载《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81页。

后终于此地^①。至14世纪末,伊斯兰教已经在东南亚一些地区取得立足点,为其后伊斯兰教的进一步传播准备了一定的条件。然而在漫长的时期内,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是相当缓慢的,其影响是很有限的,仅限于某些东西方贸易的港口,除了苏门答腊西北沿海地带,教徒也主要是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外国商人。直至14世纪末,伊斯兰教并未很快扩散到广大地区,只是到15世纪之后,伊斯兰教的传播才取得引人注目的进展^②。在印尼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旧港首先成为印尼伊斯兰教的传播中心,侨居此地华人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7世纪中叶,在苏门答腊东南部旧港地区兴起一个信奉大乘佛的海上强国,梵文名Srivijaya,意为“光荣胜利”,中国唐代史籍一般称它为室利佛逝,有时简称佛逝或佛齐。宋代以后,中国史籍改称为三佛齐。1017年,室利佛逝遭到注辇(即南印度Chola王国)的袭击。1025年,注辇又大举进犯室利佛逝本土及其在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的各属邦,室利佛逝的国力从此严重削弱,室利佛逝各属邦分崩离析,马来半岛北部各港口也为新崛起的泰国速古台(Sukhotai)王朝所侵夺。1377年以后,室利佛逝被满者伯夷(Majapahit)所征服,逐渐消亡,不少中国人遂移居旧港。永乐四年(1406),旧港华人首领梁道明派遣回回哈直(Haji)、马合谟(Mahmud)等穆斯林前往明廷朝觐,^③这表明当时旧港的华人中有些已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旧港华人穆斯林社区的形成则始于郑和下西洋。

《三宝垄华人编年史》记早期的旧港华人聚居地:“旧港自古以来就是来自福建的非穆斯林海盗的巢穴。中国明朝皇帝的舰队(指郑和下西洋)占领了旧港,将当地海盗头目陈祖义拘捕,以铁链锁铐,押回北京(应为南京——引者)。明朝官员将陈祖义斩首示众,以警戒南洋各国的闽籍华人。”^④《三宝垄华人编年史》披露了一个事实:在郑和下西洋之前,旧港华人大部分还不是穆斯林,他们的代表就是陈祖义海盗集团。旧港华人的伊斯兰化的关键是郑和捕杀陈祖义,关于此事,《明史》有如下记载:

“时爪哇已破三佛齐,据其国,改其名曰旧港,三佛齐遂亡。国中大乱,爪哇亦不能尽有其地,华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据之。有梁道明者,广州南海县人,久居其国,闽粤军民泛海从之者数千家,推道明为首,雄视一方。……(永乐)四年,旧港头目陈祖义遣子士良,道明遣子观政,并来朝。祖义亦广东人,虽朝贡而为盗海上,贡使往来者苦之。五年,郑和自西洋还,遣人诏谕之。祖义诈降,潜谋邀劫。有施进卿者,告于和。祖义来袭,被擒,献于朝,伏诛。”^⑤

^① 参见廖大珂:《早期的东南亚华人穆斯林》,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30页。

^② N. J. Ryan, A History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2.

^③ 《明太宗实录》卷5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④ H. J. de Graaf & Th. G. Th. Pibeaud, Chinese Muslims in Java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the Malay Annals of Semarang and Cerbon, Monash University (澳大利亚莫拉什大学), Monash Papers on Southeast Asia No. 12, 1984, p. 13.

^⑤ 《明史》卷324,《三佛齐传》。

陈祖义被擒的原因是他“潜谋邀劫”，《明实录》亦有类似的记载^①。

然而曾追随郑和下西洋，并亲历此事的马欢却有不同的说法：

旧港“国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昔洪武年间，广东人陈祖义等全家逃于此处，充为头目，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辄便劫夺财物。至永乐五年，朝廷差太监郑和等统领西洋大船宝船到此处。有施进卿者，亦广东人也。来报陈祖义凶横等情。被太监郑和生擒，陈祖义等回朝伏诛。就赐施进卿冠带，归旧港为大头目，以主其地。本人死，位不传子，是其女施二姐为王，一切赏罪黜陟皆从其制。^②”

马欢认为，郑和捉拿陈祖义，是因为其人“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辄便劫夺财物，”施进卿向郑和告发陈祖义“凶横等情”而引发的，并未提及“邀劫”郑和船队之事，这与《三宝垄华人编年史》的记载大致吻合。

众所周知，郑和本人是一个穆斯林，以陈祖义为首的旧港海盗集团则是非穆斯林。郑和于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下西洋时，陈祖义并未与郑和为敌，而是在次年即派遣其儿子入贡明朝，表示归顺明王朝，对郑和下西洋采取了合作的态度。然而不久双方的关系却因施进卿的告发而发生了逆转。施进卿原是旧港华人首领梁道明的副手，据说是一个穆斯林，旧港的华人之中有一部分人是穆斯林，施进卿是他们的代表，施进卿等人 与陈祖义的矛盾是否反映了旧港华人之中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斗争？无疑以施进卿为首的一派得到了同为穆斯林的郑和的支持。

那么在陈祖义被擒后，旧港又发生了什么？《明实录》记：永乐五年九月戊午，“旧港头目施进卿遣堦丘彦诚朝贡，设旧港宣慰使司，命进卿为宣慰使，赐印诰、冠带、文绮、纱罗。^③”即郑和在旧港设置宣慰使司，施进卿被任命为宣慰使，施进卿取代陈祖义成为旧港华人首领。对于旧港设置宣慰使司，《三宝垄华人编年史》则说：1407年郑和擒陈祖义之后，“旧港就建立起了印尼群岛上第一个哈纳菲（Hanafi）教派的华人穆斯林社区。^④”这就一语道出了郑和设置旧港宣慰使司的实质，就是要在旧港建立一个华人穆斯林社区。

旧港华人穆斯林社区的形成使旧港成为印尼伊斯兰教传播的中心，伊斯兰教从这里迅速传入爪哇，甚至东南亚各地。《三宝垄华人编年史》记载，“同一年（1411年），加里曼丹岛的三发（Sambas）亦出现了另一个哈纳菲教派华人穆斯林社区。”紧接着，在1411年至1416年期间，“在马来半岛、爪哇、菲律宾群岛等地，都出现了哈纳菲教派华人穆斯林社区。在爪哇，人们在雅加达（Djakarta）的安哥（Ancol）、井里汶（Tjirebon）的森垄（Sembung）、拉森（Lasem）、杜板（Tuban）、锦石（Gresik）的新

^① 《明太宗实录》卷71，第987页。

^② 马欢原著，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校注·旧港国》，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6—17页。

^③ 《明太宗实录》卷71，第995页。

^④ H. J. de Graaf & Th. G. Th. Pibeaud, Chinese Muslims in Java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the Malay Annals of Semarang and Cerbon, Monash University, Monash Papers on Southeast Asia No. 12, 1984, p. 13.

村(Tse Tsun)、贾拉丹(Djoratan)的饶洞(Djiaotung)以及其他的一些地方都建造了清真寺。^①事实上,在旧港宣慰使司建立之后,伊斯兰教传入爪哇,导致了爪哇的华人迅速伊斯兰化。马欢在爪哇,曾亲眼目睹其:“国有三等人。一等回回人,皆是西番各国为商流落此地,衣食诸事皆清致;一等唐人,皆是广东、漳泉等处人窜居此地,食用亦美洁,多有从回回教门受戒持斋。^②”至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据曾随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巩珍记载,当时爪哇的华人更是“皆投礼回回教门”^③。毫无疑问,在旧港华人穆斯林的传教活动推动下,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爪哇的华人绝大多数都皈依了伊斯兰教。

在伊斯兰教从旧港向爪哇传播的过程中,不能不提到施进卿的女儿施二姐的贡献。施进卿死后,旧港发生宣慰使的继承争端。先继承职位的是施进卿的儿子施济孙,但实际控制权则掌握在施进卿的女儿施二姐手中。施济孙就派一个叫丘彦成的人到明朝廷请封,说:“旧印为火所毁”,就是说印可能是掌握在施二姐手中,施济孙企图抢先得到明朝的册封,造成事实。明成祖遂派遣郑和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专程去了旧港,去封宣慰使。但是,施二姐根据施进卿“本人死,位不传子”的遗嘱,与施济孙竞争。郑和到旧港见到“是其女施二姐为王,一切赏罪黜陟皆从其制”^④。于是就封施二姐为宣慰使,从而确立了施二姐的统治地位,施二姐就被称为“俾那智施氏大娘仔”。俾那智是马来语 Perinatin 的音译,意思是首领。施二姐在旧港的统治一直继续到正统五年(1440)以后。施二姐后来移居爪哇的港口新村(爪哇名革儿昔, Geresik, Grisse),新村是华侨所创建,居民主要是广东和福建人。施二姐不仅财力雄厚,而且拥有海船众多,开展对外贸易,把新村建成爪哇的一个商业中心和国际贸易港口,被满者伯夷封为蕃舶长,即沙班达尔,管理对外贸易事务。新村创建之初,人口仅千余家,^⑤经过华人的开拓,到1523年竟发展成为拥有3万穆斯林人口的繁华港口^⑥。施二姐对传播伊斯兰教功不可没焉。

施二姐收养一个儿童,把他抚养教育成人,这人就是苏南·吉里。苏南·吉里长到12岁时,为了让他接受伊斯兰教育,施二姐把他托付给彭瑞和(下面另行介绍),彭瑞和为他取名拉登·巴古(Raden Paku),并将女儿嫁给他。拉登·巴古后来成为伊斯兰教长,在革儿昔附近的吉里开辟教区,建立清真寺和居所,热心传教,吸引来大批的改

^① H. J. de Graaf & Th. G. Th. Pibeaud, Chinese Muslims in Java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the Malay Annals of Semarang and Cerbon, Monash University, Monash Papers on Southeast Asia No. 12, 1984, p. 13. 另参见葬牙拉查·翁冈·巴林桐安:《端古劳》(Tuanku Rao),引自李炯才:《印尼——神话与现实》,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84页。

^② 马欢原著,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校注·爪哇国》,第11页。

^③ 巩珍:《西洋番国志·爪哇国》,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明人罗日褰亦称:爪哇“唐人持斋受戒”,都信奉伊斯兰教。(参阅罗日褰:《咸宾录》南夷志卷6,《爪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5页。)

^④ 马欢原著,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校注·旧港国》,第17页。

^⑤ 马欢原著,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校注·爪哇国》,第9页。

^⑥ B. Schrieke, Indonesian Sociological Studies, Part one, The Hague, 1955, p. 25.

教者，从而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故被称苏南·吉里。满者伯夷国王曾派兵进行镇压，吉里率领穆斯林击退了满者伯夷的进攻，被满者伯夷国王封为革儿昔省的统治者^①。他对伊斯兰教的传播贡献最大，他和他的继承人“在向龙目、望加锡、库泰（东加里曼丹）和帕西尔（东南加里曼丹）传播伊斯兰教方面起了主要作用，他们通过征服、婚姻或以前的学生的传教工作传播伊斯兰教”，被印尼人认为是爪哇伊斯兰九贤中最伟大者，^②所以抚养教育他的施二姐也在爪哇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印尼的学者说，数百年来，“俾那智（即施二姐）的名字深深地藏在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心中，他们十分喜爱俾那智的传奇故事和她的养子苏南·吉里，他是九贤中最伟大的圣人。”如果不是当年郑和在旧港建立宣慰使司和华人穆斯林社区，并根据实际情况，封施二姐为旧港宣慰使，当然就不会有施二姐的后来发展，也就不会有她的养子苏南·吉里传播伊斯兰教的事迹了。

三、郑和等人在爪哇传播伊斯兰教

《三宝垄华人编年史》曰：郑和下西洋，“由海军司令哈吉三宝公（Hadji Sam Po Bo，指郑和）率领的中国明朝皇帝的舰队控制了南洋各海域与海岸。”^③但在郑和下西洋之前，马来半岛与印尼群岛大部分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人民除了信奉佛教和印度教，还保留相当浓厚的原始宗教信仰，因此常与穆斯林商人发生冲突。马欢描写当时的爪哇，“其国风土无日不杀人，甚可畏也。”^④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郑和等人积极在上述地区传播伊斯兰教，借伊斯兰教来“导以礼义，变其夷习”，提高当地人民的文明程度，以建立东南亚长久稳定的局面。根据《三宝垄华人编年史》的记载，郑和在爪哇传播伊斯兰教的活动有以下两个方面：

1、积极在爪哇建立清真寺，举行伊斯兰宗教活动。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教徒聚会交往，从事宗教礼仪和节日庆典活动的场所，不仅起着维系教徒的重要作用，而且也是宣传伊斯兰教的主要阵地。因此，郑和访问爪哇之后，在郑和的推动下，“接着 1411 年，在安哥(Ancot)即雅加达、井里汶(Cinebon)、杜板(Tuban)、锦石（即革儿昔）、惹班(Mojokertor)及爪哇其它地方，纷纷建立清真寺”^⑤。1413 年，郑和第四次下西洋，船队碇泊在三宝垄，郑和与随从马欢、费信等人一起去当

^① Sri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The History of Java, London, 1821, Vol. II, pp.118-119.

^② 梅·加·李克莱弗斯著，周南京译：《印度尼西亚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年，第 55 页。

^③ H. J. de Graaf & Th. G. Th. Pibeaud, Chinese Muslims in Java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the Malay Annals of Semarang and Cerbon, Monash University, Monash Papers on Southeast Asia No. 12, 1984, p. 13.

^④ 马欢原著，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爪哇国》，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年，第 18 页。

^⑤ 莽牙拉查·翁冈巴林桐安：《端古劳》(Tuanku Rao)，引自李炯才：《印尼——神话与现实》，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9 年，第 84 页。

地的清真寺祈祷^①。“中国明朝皇帝的舰队在三宝垄停泊了一个月，以休整船舶。海军司令哈吉三宝公偕同哈吉马欢与哈吉费信，经常到三宝垄的哈纳菲教派华人穆斯林社区的清真寺中去膜拜。”^②据说三宝垄的三保庙就是当年“三保太监及其侍从所建的回教堂”^③。因此郑和深受华人穆斯林的敬仰和爱戴，“在三宝垄的哈纳菲教派的华人穆斯林清真寺内，人们举行了一个特别的祭祀仪式，华人穆斯林为海军司令哈吉三宝公祷告庆贺。”^④郑和等人的伊斯兰教活动，扩大了伊斯兰教在爪哇的影响和传播。

2、积极培植华人穆斯林势力，建立华人穆斯林社区。

为了传播伊斯兰教，郑和还团结当地的华人穆斯林，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华人穆斯林社区，作为宣传伊斯兰教的基地，对当地人民传播伊斯兰教。因此，在爪哇各地，华人穆斯林社区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

在满者伯夷首都，郑和与吴宾先后出使满者伯夷^⑤。根据《塔兰华人编年史》记载，吴宾被称为“海军司令哈吉公吴宾（Laksamana Hadji Kung Wu Ping）”，作为明朝的使节他于1408—1415年驻在满伯夷首都，他也是一位穆斯林，热心宣传伊斯兰教，使满者伯夷宫廷与伊斯兰教发生了接触。吴宾还在三宝垄附近的萨林迪尔（Sarindil）和塔兰（Talang）建立了一个哈纳菲教派的华人穆斯林社区^⑥。为了给下西洋的船队引航，他在当地一座名为贾蒂山（Gunung Djati）的山顶上修建了一座灯塔。^⑦他后来死于爪哇，葬在雅加达附近的安哥，其陵墓旁还建有寺庙来纪念他^⑧。另外，在爪哇其它地区，如井里汶、杜板、锦石、惹班等地，郑和也都建立了类似的华人穆斯林社区^⑨。据印尼《独立报》，1414年，费信随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曾帮助巽他·葛拉巴（今雅加达）王国免受海盗“黑龙帮”的侵扰，建议它建立华人伊斯兰教社团，葛拉巴因此与郑和建立了亲密关系。

到1415年，随着郑和舰队的到来，在井里汶地区的森垒、沙林迪尔（Sarindil）以及塔兰（Talang）等村落，哈纳菲教派的华人穆斯林已纷纷建立起穆斯林社区，而且每

^① Slametmuljana, Islam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Islamic State of Demak, 新加坡《南洋学报》，第27卷，1972年第1、2期合辑。

^② H. J. de Graaf & Th. G. Th. Pibaud, Chinese Muslims in Java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the Malay Annals of Semarang and Cerbon, Monash University, Monash Papers on Southeast Asia No. 12, 1984, p. 14.

^③ 李炯才：《印尼——神话与现实》，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85页。

^④ H. J. de Graaf & Th. G. Th. Pibaud, Chinese Muslims in Java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the Malay Annals of Semarang and Cerbon, Monash University, Monash Papers on Southeast Asia No. 12, 1984, p. 16.

^⑤ 《明史》卷324，《爪哇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8403页。

^⑥ Slametmuljana, A Story of Majapahit, Singapore, 1976, p. 226.

^⑦ H. J. de Graaf & Th. G. Th. Pibaud, Chinese Muslims in Java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the Malay Annals of Semarang and Cerbon, Monash University, Monash Papers on Southeast Asia No. 12, 1984, p. 37.

^⑧ Slametmuljana, A Story of Majapahit, Singapore, 1976, p. 245.

^⑨ Slametmuljana, Islam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Islamic State of Demak, 新加坡《南洋学报》，第27卷，1972年第1、2期合辑。

一个社区都有一个清真寺。为了接待郑和船队,“沙林迪尔村的任务是为修理海舶提供柚木,塔兰村的任务是管理海港,而森垒村的任务则是管理灯塔。除此之外,这三个哈纳菲华人穆斯林村庄的共同任务是为中国明朝舰队的船只提供给养。^①”

为了巩固华人穆斯林社区,郑和在各社区任命了华人首领,依靠他们进一步传播伊斯兰教。1419年,“海军司令哈吉三宝公任命占婆(Tjampa)的哈吉彭德庆(Hadji Bong Tak Keng)为南洋各地蓬勃兴起的各哈纳菲教派华人穆斯林社区的总管。^②”当时的占婆是伊斯兰教传播的一个中心^③,彭德庆是一名来自云南的穆斯林,曾被占婆政府任命为官员,以促进海外贸易。他受命担任海外华人总管后,很重视在东南亚各国传播伊斯兰教,因此任命了许多来自云南的华人穆斯林为各个港口的华人首领^④。

1423年,彭德庆任命哈吉颜英裕(Hadji Gan Eng Tju)负责管理爪哇、旧港以及加里曼丹三发三地蓬勃发展的华人穆斯林社区。^⑤颜英裕也是一名来自云南的穆斯林。由于当时的杜板是满者伯夷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在某种程度上,颜英裕俨然成为明朝皇帝和中国政府在爪哇的总领事,控制着南洋南部地区各国包括爪哇、旧港和三发等地在内的所有华人穆斯林社区”。因此,“哈吉颜英裕事实上又成为杜板的港务长(Kepala Pelabuhan pula di Tuban)。”他为满者伯夷朝廷掌管对外贸易,兢兢业业,深得满者伯夷女王苏京达(Radja Su King Ta,指1429—1447年在位的Suhita)的欢心,被授予“阿鲁亚”(Ayra)的贵族称号。^⑥

还值得一提的是彭德庆的女婿哈吉马洪福(Hadji Ma Hong Fu)。《三宝垄华人编年史》说他是明朝云南总兵之子,于1424年奉明朝皇帝的派遣,出使满者伯夷。他与妻子由哈吉费信一路陪同,从三宝垄前往满者伯夷朝廷。^⑦马洪福的妻子名Putri Tjampa,意即“来自占婆的公主”,爪哇民间传说将印尼群岛的伊斯兰化归功于“占婆公主”。马洪福作为明朝的特使在满者伯夷住了多年,直到1448年,他的妻子去世并按照伊斯兰教的风俗在满者伯夷埋葬后,才于翌年离开爪哇返回中国。马洪福在返国途中,曾在三宝垄作短期逗留。^⑧可见马洪福与其妻对伊斯兰教在爪哇的传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① H. J. de Graaf & Th. G. Th. Pibeaud, Chinese Muslims in Java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the Malay Annals of Semarang and Cerbon, Monash University, Monash Papers on Southeast Asia No. 12, 1984, p. 37.

^② 同上, p. 14.

^③ Slametmuljana, A Story of Majapahit, Singapore, 1976, p. 231.

^④ Slametmuljana, Islam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Islamic State of Demak, 新加坡《南洋学报》,第27卷,1972年第1、2期合辑。

^⑤ H. J. de Graaf & Th. G. Th. Pibeaud, Chinese Muslims in Java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the Malay Annals of Semarang and Cerbon, Monash University, Monash Papers on Southeast Asia No. 12, 1984, p. 15.

^⑥ 同上, pp. 15-16.

^⑦ 同上, p. 16.

^⑧ H. J. de Graaf & Th. G. Th. Pibeaud, Chinese Muslims in Java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the Malay Annals of Semarang and Cerbon, Monash University, Monash Papers on Southeast Asia No. 12, 1984, p. 20.

另外,郑和在东爪哇的都马板(Tu Ma Pan,都马板为东爪哇 Tumapel 的译音,即今 Aadiri 地区)地区拥有一片土地。1430年,郑和将这块土地送给满者伯夷女王苏京达(Radja Su King Ta,指1429—1447年在位的女王 Suhita),并委任哈吉颜英裕的弟弟颜英旺为满者伯夷统治下的都马板地区的总督。^①

郑和所建立的华人穆斯林社区不仅促进了华人穆斯林势力的发展,也为伊斯兰教进一步在爪哇当地人民之间的传播打下了基础,因此郑和受到爪哇华人深深的爱戴和尊敬。当1431年(应为1433年之后),“海军司令哈吉三宝公与世长辞,三宝垄地区哈纳菲教派的华人穆斯林为他举行了名为盖布(Ghaib)的伊斯兰祷告仪式。”^②

四、淡目伊斯兰国的建立

1433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后,明朝政府停罢了“西洋之役”,大规模的下西洋的航海活动戛然而止,这对海外华人穆斯林无疑是一重大打击。《三宝垄华人编年史》有如下描述:“由于明朝势力的衰微,中国明朝的舰队不再前来拜访南洋各国的哈纳菲华人穆斯林社区。于是,各地的哈纳菲华人穆斯林社区开始衰落。大批的清真寺也渐渐地转变成为三宝公庙,同时在祭壇上供放着三宝公的神像。在三宝垄、安哥、拉森及其他地方的情况均是如此。”^③在其他地区,“与中爪哇和东爪哇北部沿海地区的情况相似,由于与中国大陆断绝了来往,导致井里汶各地哈纳菲华人穆斯林社区陷入衰微。沙林迪尔村的清真寺成了一座没有人烟的破庙,因为当地的华人穆斯林社区已经消失。塔兰村的清真寺则变成了一座中国庙。”不过,森盆的哈纳菲华人穆斯林社区却因为坚定不移地信奉伊斯兰教,坚持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中文,因而保持繁盛。^④

在这种形势下,颜英裕肩负起振兴伊斯兰教的重任,他在郑和死后,继承郑和的遗愿,继续努力推动伊斯兰教的传播。他委任孙龙为旧港华人首领,彭德庆的孙子彭瑞和为思吉(Yorthan)港的华人首领^⑤。

关于孙龙,《三宝垄华人编年史》记曰:1443年,“由于非穆斯林的华人海盗经常袭击旧港的华人穆斯林社区,颜英裕决定派遣三宝垄火药厂的东主孙龙(Swan Liong / Naga Berlian)前往旧港,担任当地华人穆斯林社区的甲必丹。孙龙爪哇名为 Aria Damar,是一个非常能干的火炮制造工匠,而且是一个混血儿,母亲为华人。据说孙龙事实上是满者伯夷国王 Prabu Wisesa/Raja Madjopahit 的儿子。”^⑥

^① H. J. de Graaf & Th. G. Th. Pibeaud, Chinese Muslims in Java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the Malay Annals of Semarang and Cerbon, Monash University, Monash Papers on Southeast Asia No. 12, 1984, p. 17.

^② 同上, p. 17.

^③ 同上, p. 20.

^④ 同上, pp. 37-38.

^⑤ Slametmuljana, Islam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Islamic State of Demak, 新加坡《南洋学报》,第27卷,1972年第1、2期合辑。

^⑥ H. J. de Graaf & Th. G. Th. Pibeaud, Chinese Muslims in Java in the 15th and 16th

关于彭瑞和，他教名苏南·岸佩尔(Sunan Ngampel)，是伊斯兰传教士，在《爪哇纪年》中被称为拉登·拉赫迈特(Raden Rahmat)^①，并说他是爪哇伊斯兰教的开创者。彭瑞和原住在占婆，他的姑姑达拉瓦提(Dwarawati)从占婆嫁给满者伯夷国王格尔达布米(Kertabhumi，又称 Brawijaya)，达拉瓦提是华人穆斯林，死后按伊斯兰仪式葬于东爪哇，其墓至今尚存。彭瑞和为了寻找他的姑姑，离开占婆，先到旧港，第二年(1446年)到爪哇的杜板，在那里爱上了颜英裕的女儿，与她结婚后，于1447年被任命为思吉港的华人首领。当彭德庆和颜英裕相继去世后，在与中国来往断绝的困境下，彭瑞和担负起统管爪哇、旧港以及加里曼丹三发等地日益衰落的华人穆斯林社区的责任。

1451年，思吉港的华人穆斯林社区因对外贸易不景气而衰落，彭瑞移居泗水，致力于在岸佩尔、泗水、淡目、马都拉等地从事传教工作。他先在泗水附近的岸佩尔传教，得到一批华人和爪哇人的信徒，把这个地区开辟为教区，继续从事传教活动。为了密切各地华人穆斯林社区与爪哇土著居民的关系，使更多的爪哇人信奉伊斯兰教，彭瑞和决定放弃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中文的传统，改用爪哇语传教，从而在爪哇建立起第一个当地人的穆斯林社区，故名岸佩尔，因为在印尼，这些伊斯兰传教师往往把他所创建的教区作为传教名称。由于他对伊斯兰教的传播作了突出的贡献，被奉为爪哇的伊斯兰九贤之一^②，彭瑞和的墓现在还在泗水。彭瑞和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养子，都对伊斯兰教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伊斯兰九贤的成员，两个儿子即苏南·波囊(Sunan Bonang)、苏南·达查(Sunan Drajat)，养子即前面提及的苏南·吉里。

而孙龙则有2个养子，一名叫陈文(Jin Bun)，爪哇名拉登·巴达(Raden Pateh)；一名金山(Kin San)，爪哇名拉登·侯赛因(Raden Hussin)。据说陈文原是满者伯夷最后的国王格尔达布米与中国公主结婚所生的儿子。据爪哇的史料，满者伯夷国王有一个妾是中国妇女，但是国王的妻子不喜欢她，当孙龙被任命为旧港统治者后，1455年满者伯夷国王就把这个妾送给孙龙。当她离开宫廷时已怀有身孕，后生下陈文，大多数学者也认为陈文有一半的华人血统，即华人妇女与爪哇人结婚所生。孙龙把陈文和金山抚育成人，教会他们勇气、战略和领导艺术。1474年，陈文和金山成年后，按照孙龙的嘱咐，离开了旧港去爪哇，前往满者伯夷的途中在三宝垄登岸，访问那里的清真寺，接着到泗水，住在彭瑞和家中，成了他的弟子，进一步学习伊斯兰教。一年后，陈文受彭瑞和派遣，来到三宝垄以东的宾塔罗(Bintara)，开辟新的穆斯林社区。至于金山，彭瑞和则派遣他前往满者伯夷朝廷，为满者伯夷服务，后来他成为满者伯夷军队的统帅。

陈文到了宾塔罗后，遵照彭瑞和的指示，清除那里的丛林，建立了一个爪哇人的穆斯林社区，传播伊斯兰教。随着他信徒人数不断增多，势力迅速壮大，在1477年他率领1000名穆斯林军队征服了三宝垄，扩大了伊斯兰教在爪哇的影响。陈文保护那里的

Centuries: the Malay Annals of Semarang and Cerbon, Monash University, Monash Papers on Southeast Asia No.12, 1984, p.18.

^① Slametmuljana, A story of Majapahit, op.cit, p.237.

^② Slametmuljana, Islam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Islamic State of Demak, 新加坡《南洋学报》，第27卷，1972年第1、2期合辑。

清真寺和非穆斯林的华人，因为他需要华人的造船技术和其它手工艺技术，华人也与陈文结盟。征服三宝垄后，陈文和彭瑞和受到满者伯夷国王的接见，国王在照镜子时发现陈文与他相象，就承认了陈文是他的儿子，任命他为宾塔罗的统治者，并将淡目作为他的首都，条件是他每年必须到满者伯夷的宫廷一次。于是陈文回到宾塔罗，但他没有再去满者伯夷宫廷，因为他知道了当年国王放逐了他的母亲的事情后，就对国王产生了怨恨，他要准备进攻满者伯夷。1478年，彭瑞和去世时，陈文没有出席他的葬礼，因为他正率领伊斯兰联军（包括杜板、马都拉等地的伊斯兰传教士率领的军队）进攻满者伯夷，与金山率领的满者伯夷军队作战。陈文终于击败满者伯夷，占领满者伯夷首都，建立了爪哇第一个伊斯兰教国家——淡目王国，而满者伯夷则成为淡目的属国，存在到1527年才灭亡。关于满者伯夷的战败，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国王不愿与他的儿子决战而临阵脱逃；一说是陈文在战斗中将要失败时，打开了一个盒子，里面飞出大量黄蜂袭击满者伯夷的军队，导致了陈文的胜利。关于国王的命运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他被俘后被软禁在淡目，受到优待，有的说他率随从逃往巴厘岛。关于陈文的事迹在《爪哇编年史》和《三宝垄华人编年史》中的记载是一致的，可以相互印证。

淡目王国后来曾统治着印尼大部分地区，随着它的扩张，把伊斯兰教传播到印尼各地。印尼成为伊斯兰教国家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这是印尼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从此伊斯兰教势力迅速扩展到整个爪哇岛以及群岛其它地区。总之，这一巨大变革是以郑和与华人穆斯林在东南亚所进行的伊斯兰宗教活动为基础的。正是由于他们的杰出贡献，在15世纪后的短短时期内，“伊斯兰教从群岛的一端迅速蔓延到另一端，这也许在宗教史上是没有先例的”^①。在伊斯兰教传播的过程中，华人穆斯林也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世代繁衍，构成了爪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1513年，葡萄牙人皮里士（Tome Pires）奉王命出使中国，途中曾在爪哇居留了5个月，在这里他遇见了许多包括华人在内的外国穆斯林商贾的混血儿后裔，这些富裕的外国商贾混血儿控制着当地的对外贸易。^②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福建龙溪人王大海至爪哇侨居，亦见到当地“华人有数世不回中华者，遂隔绝圣教，语番语，食番食，衣番衣，读番书，不屑为爪亚（Java），而自号息垄（即Islam的译音），不食猪犬，其制度与爪亚无异。日久类繁，而和兰（即荷兰）授与甲必丹，使分管其属焉。”^③

（责任编辑 李建欣）

^① S.Q. Fatimi, *Islam Comes to Malaysia*, Singapore, 1963, p.93.

^② Armando Cortesao,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 An Account of the East, from the Red Sea to Japan, Written in Malacca and India in 1512-1515*, London, 1944, Vol. II, p.179.

^③ 王大海：《海岛逸志》卷3，《诸岛考略》，香港：学津书店，1992年，第61页。